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编长

第二卷 1956-1966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刘国新 贺耀敏 刘晓 武力 主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长编

第二卷 1956-1966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刘国新 贺耀敏 刘晓 武力 主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长编. 第2卷, 1956~1966 / 刘国新等主编.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0. 2
ISBN 978-7-201-06468-0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中国—现代史—1956~1966 IV. ①K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17620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h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hs@126.com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年2月第1版 2010年2月第1次印刷

787×1092毫米 16开本 34.75印张 5插页

字数: 720千字

定价: 187.00元

总编委会

总主编	刘国新	贺耀敏	刘 晓
	武 力		
副总主编	杨凤城	齐鹏飞	丁 明
	钟真真		
编 委	安建设	傅玉能	王树荫
	张 蒙	罗燕明	苏 浩
	何虎生	毛仲伟	夏 潮
	李松林	彤新春	陈思训
	彭 卫	于剑波	朱立南
	林 嘉		

第 二 卷

(1956 — 1966)



第二卷 编委会

主 编 刘国新 刘 晓
副主编 王树荫 杨凤城 傅玉能
作 者 (按姓氏笔画排序)

牛 军	王 进	王 炎	王树荫
王 虹	冯毓奎	母稷祥	石善涛
刘占义	刘国新	刘 晓	刘 晶
孙从远	江秀平	许世荣	许剑波
齐鹏飞	何虎生	何政兵	宋月红
张国友	张国雄	张春燕	张 丽
张 蒙	李 英	杨凤城	杨文利
沈红霞	沈谦芳	肖艳莉	肖 翔
彤新春	里 凡	陈 岳	林 嘉
武 力	金鸣娟	姚 力	姜长青
胡明华	赵 旭	赵海松	钟真真
倪晓华	唐金权	夏 潮	柴观珍
贾庆国	曹希龄	章百家	阎茂旭
黄 伟	黄军衔	傅玉能	蒲 俦
魏建克			

前 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长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之际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作者与编者共同努力的结晶。

写这本书的初衷就是“存史”。至于怎么存?却是有些说道的。

就共和国史而言,以单一的体裁叙述历史,有时会显得力不从心。因为人类社会一旦搭上现代化这趟快车,就不太可能是一个直线的轨迹了,社会的整体性和网络化以及与外部世界的关联程度都决定了历史面貌的立体化结构。为了能对此有一个很好的表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长编》由“总论”、“重大事件”、“文献资料”、“人物”及“大事记”五部分组成。五个部分既是独立的,又能互为补充。

“总论”,顾名思义,是史论,是论说本阶段历史概貌。这部分内容侧

重分析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每个阶段有哪些不同的特点。此外,对主要成就的归纳和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总论”的题中之义。在写作方法上,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以事引论。在对成败的判断上虽然不可能用太多的笔墨,但也不是浅尝辄止。读者通过“总论”会得到一个总括性的印象。

“重大事件”就是按照中国传统史学纪事本末体的写法,尽可能完整地揭示重要事件的起因、过程和结局。哪些属于“重大事件”呢?首先是政治运动和社会变革,比如“三反”、“五反”运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禁毒运动”;接下来是重要的事件、决策和会议,比如抗美援朝战争、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再接下来就是治国理念和方略、重要的思想、重要成就,比如“三步走”发展战略、“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等;还有主要的社会现象、社会思潮、社会习俗、突发公共事件以及重大自然灾害,比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防治“非典”、抗震救灾等等。大体说来,前30年因为政治运动较多,一个事件基本上就是一次运动,比较容易独立成篇;后30年国家各项工作的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不再搞运动,所以,“事件”更多的是表现为某个领域的发展、某项政策的贯彻、某一方略的提出。不管是政治运动也好,还是发展方略也罢,它们都是历史的关节点,点点相连,就组成共和国历史的脉络主线。我们在这部分里面还安排了“港澳台”专题,对于1997年前的香港和1999年前的澳门,为了照顾历史的完整性,也作了简单的引述性记载。在编排上,依照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几大板块排列,每个板块内按时间的先后为序。

“人物”吸收了传统史学纪传体的长处,简述人物的经历。传主为在共和国创立、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建功立业的人物,也适当地收录了其他方面的代表人物。这里有两个具体的标准,首先是已经去世的,仍然健在的不收。其次是凡党政军系统人物一般按正部级以上出条,其他方面如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学术界的人物则以其学术成就和社会影响为依据,这里面虽然很难定出一个明确的标准,但从约定俗成或公众认可的角度看,还是能够画出一个杠杠的。人

物按姓氏音序排列。

“大事记”是学习传统史学编年史体例,以年、月、日、为经,以事件为纬。在遵守通常的编写大事记体例的基础上,本书还有自己的考虑。其一,从史学定位看,本书的“大事记”是中观史学,甚至包括一点点微观事件。因为以全书的互补关系,“重大事件”主要反映宏观史学,那么,“大事记”定位于中观带点微观就是恰如其分的,这充分体现本书各个部分所代表的不同层次。其二,从收录的领域看,“大事记”除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以外,还有教育、科技、新闻、出版、学术、卫生、体育、民族、宗教、国土、人口、气象等林林总总的事,它编织的是一幅更为细密的网络。“大事记”有部分内容同“重大事件”相重复,本书的处理办法是,凡“重大事件”已有的,“大事记”一概从简。

“文献资料”包括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军、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组织沿革和职官,以及研究成果总目。

本书的九卷分别是“重大事件”六卷:第一卷(1949—1956)、第二卷(1956—1966)、第三卷(1966—1978)、第四卷(1978—1991)、第五卷(1992—2002)、第六卷(2002—2009)。这种分法,不是本书的独创,完全是参照近些年学术界,包括党史学界和国史学界关于阶段的划分法,同时也自觉这六卷的编排无论从其所呈现出来明显的阶段性,还是从国

家最高层级的对应上也还说得过去。第七卷为“人物”卷，第八卷和第九卷为“大事记”卷。

粗粗算来，国内对于共和国史研究有近30年了，出版著作百十来部，时间和数量能不能成为一个标志，还很难说，因为绝大多数著作都是教材。我们认为，共和国史若真正成为一门学科，按史书范式写出一批论著是基本条件。本书不敢妄谈水平多

高，但宽领域、多视角的记述，多多少少还是做到了存史的目的。把过去发生的事情娓娓道来，写清楚它们的来龙去脉，应了孔子所说的“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和刘知几所强调的“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的要求。如果条件允许，本书每隔10年重新补充修订一次，长此下去，也会成为一个可观的文化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长编

(第二卷 1956—1966)

目 录

总论

- 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十年 (1)

重大事件

-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 (16)
-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 (29)
- 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38)
- 第二个五年计划 (44)
- “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 (53)
- 第一次郑州会议与中共八届六中全会
..... (60)
- 第二次郑州会议与中共八届七中全会
..... (67)

-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75)
- 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会议 (82)
- 1959年庐山会议和“反右倾机会
主义” (84)
- 西藏平叛与民主改革 (88)
- 最高人民法院特赦战争罪犯 (99)
- “七千人大会” (102)
- 国民经济的调整 (117)
- 60年代初农村推行包产到户的
尝试 (125)
- 政治和社会关系领域的政策调整
..... (142)
- 向雷锋学习运动 (156)
- 工业学大庆运动 (158)
- 农业学大寨运动 (162)
- 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运动 (164)

广泛学习英雄模范人物的活动 (166)	的确定 (278)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175)	中苏关系的分歧与恶化 (281)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80)	中苏论战 (289)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 (189)	中美大使级会谈 (301)
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 会议 (191)	台湾海峡紧张局势与炮击金门 (311)
西藏自治区成立 (194)	60年代的中日关系 (317)
“大跃进”时期的税制变革 (197)	周恩来三次出访和新中国第二次 建交高潮 (331)
中央经济权力的下放与回收 ... (206)	60年代前期中国对外政策的转变 (344)
试办托拉斯 (214)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经济 建设与科技发展的主要成就 (361)
“双百”方针的初步贯彻 (219)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 卫生与体育事业的主要成就 (374)
教育革命和教育事业的整顿 ... (236)	港澳台地区概况 (385)
两种教育制度的提出与实施 ... (248)	
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与爆炸成功 (256)	
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 (258)	
60年代的农村合作医疗 (261)	
1958年反教条主义的斗争 (268)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 (272)	
全军大比武活动 (275)	
国防战略的变化与“大三线”建设	

附录

党、政、军、民主党派、人民团体、 各级组织沿革和领导成员名录 (412)
国史研究论著索引 (498)

总 论



在探索中曲折 发展的十年

从1956年中国共产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到1965年底“文化大革命”爆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国家在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既积累了重要的经验，也存在着严重的失误；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遭到过严重的挫折。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十年。

中共八大前后建设中国 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已经建立起来，党和国家也就面临着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新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课题。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在外交上实行“一边倒”的政策，在社会主义建设上，也以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与文化作为自己的发展模式。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缺乏经验，又缺乏理论与思想上的准备，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必然为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所仰慕、向往，在这种情况下，党号召学习苏联，有历史的必然性，也有积极

的意义。

但是,新中国成立初年的学习苏联,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作用。如在学习苏联的口号下,出现了盲目照搬苏联经验的做法,在政治宣传上,过多地宣传苏联“老大哥”,片面地宣传苏联的成就,宣传“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无益于辩证地看待苏联经验,在一些地方和一些场合,甚至将苏联经验奉为神圣,不容怀疑与讨论。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时代结束,开始了向新方针、新格局的转变,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举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尖锐地揭露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特别是个人崇拜、个人专断和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错误。暴露和纠正斯大林的错误,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强烈的震动,同时也具有解放思想的意义。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破除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迷信,解放被新的教条主义绳索束缚的思想,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具有转折性的意义。

从1956年开始,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比较多地注意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自己的经验,考虑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问题。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是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而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是这个探索取得的初步成果。

为起草八大政治报告,刘少奇从1955年12月开始听取中央各部委的汇报,接着,毛泽东也找了34个部委听取了汇报,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政治局和书记处

的成员也听取了汇报,1956年4月开始,又听取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汇报。在此期间,工业、交通部门的900个重要的工厂和建设工地也向中央作了书面汇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人这样大规模地听取汇报,进行调查研究,其目的就是要总结经验,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寻找一条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地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34个部委汇报结束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了几次会议,对汇报和讨论中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和归纳,概括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到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先由毛泽东讲《论十大关系》,而后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经政治局赞同后,毛泽东在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正式报告。这个报告的主要精神,就是“以苏联为鉴戒,总结我国已有的经验”,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毛泽东的讲话,主要谈的是经济问题,前三条讲的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毛泽东指出,重工业是国家建设的重点,但是决不可以因此而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不平衡、轻视农业而发生了严重的问题,中国在这方面没有犯原则性错误,今后还要适当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过去因朝鲜战争和国际局势的紧张,对沿海工业重视不够,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的生产能力和技术力量,只有沿海新建工业更多更快地积累,才能更有

力地支持内地工业。在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关系上,毛泽东说,国防建设必须建立在经济建设的基础上,应把军政费用降低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多搞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才能有更大的进步。这些问题涉及了开辟一条与苏联、东欧不同的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问题。毛泽东讲话的第四、第五条,是关于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毛泽东指出要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的利益,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后五条是关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关系。毛泽东指出,要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在党和非党关系问题上,毛泽东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如此,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在中国和外国关系上,毛泽东指出,我们要坚持两点论,我们的方针是,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照搬。这些都涉及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中调动各种积极因素的问题。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上摆脱苏联模式,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始。毛泽东的探索,在党内和理论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因此在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出现了一股调查和探索的风气。1956年7月21日,周恩来在

上海市党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强调现在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应该是: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周恩来认为,在我们还不能普遍直接选举人民代表的时候,扩大民主的办法:一是使人大代表经常接触人民;二是把人民代表在人代会上的发言,包括批评政府工作的发言,不管是错的对的都发表出来,这有利于揭露政府工作中的缺点;三是使人民代表检查政府工作,一直到检查公安、司法工作。周恩来提出,社会主义民主的长期任务及其近期扩大的办法,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背景下,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作为执政党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基本任务是,总结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展示出一大批探索的成果,主要的是:

第一,关于对国内主要矛盾问题的分析。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领导人民取得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的决定性胜利,这就表明,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剥削制度的历史已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国人民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最后消灭剥削制度、为彻底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

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关于国内主要矛盾问题的分析,突出了我国生产力发展还很落后这一基本国情,强调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去发展生产力。这些论述,是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以后中国共产党确定自己的正确路线的政治基础。

第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周恩来的报告就近年来党领导经济工作中所感到的比较突出的问题强调指出,应该根据需求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大会认为,如果对凭借有利条件较快地发展我国生产力的可能性估计不足,那就是保守主义的错误;如果不估计到各种客观限制而规定一种过高的速度,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必须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这两种错误倾向。陈云在发言中提出了著名的“三主体三补充”方针,即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济是补充,计划生产是主体,在计划许可范围内按市场变化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的自由市场是补充。这个意见对于克服社会主义高潮中给经济体制带来的一些弊病和出现的盲目求纯(即公有制)的思想,有重要的

意义。

第三,在国家工作方面,规定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必须扩大民主、健全法制的的基本原则,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加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继续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这个方面,董必武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认为,在废除旧的《六法全书》之后,要逐步完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制,写出自己的《六法全书》,要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劳动法、土地使用法等一系列法律。董必武还明确提出了党政职能分开的原则,认为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可以使党和政府的活动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第四,党的工作。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提出了在全国执政的情况下加强党的建设的主要方针,要求重视党内思想教育,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开展党内民主生活,健全民主集中制,加强对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大会提出反对突出个人和对个人的歌功颂德行为的方针,继续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确定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会议中提出的许多新方针和设想都富有创新精神,对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八大一次会议后,进一步的探索和对八大精神的落实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按照八大的方针,编制1957年经济建设计划和调整若干方面的经济关系;二是准备全党整风,正确处理日渐突出的各种人民内部的矛盾。

对1957年的经济建设计划,当时出现了重要的争论。毛泽东认为,1956年财政

开支和基本建设投资中不正确的部分不到“一个指头”，主张1957年预算指标可以高一点。周恩来等人则主张宁肯慢一点，稳当一点，1957年的预算指标应当压低一点。1956年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提出了“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得到大会的赞成。毛泽东对此有不同意见，后来成为批判反冒进的由来之一。

在全党整风问题上，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1956年秋冬，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紧张，导致一些地方发生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和农民闹退社、闹缺粮的风潮。在“双百”方针提出来后，知识分子思想日趋活跃，出现了在文化、教育、科学等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以及对党和政府工作、干部作风等问题上的批评。这些人民群众同他们的领导者即人民政府和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矛盾，是一个新的问题，全党整风，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大措施。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了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这些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性质的矛盾，前者是对抗性的矛盾，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后者是非对抗性的，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这样，就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毛泽东认为，提出划分敌我和

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与文化，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国家。这是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一个新的成果，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1957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论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估计，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基本性的也是长期性的方针，并且提出了“放”的方针，放手让大家提意见，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

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和政策的基础上，1957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发动全党整风，揭露和检查、纠正各个方面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深入地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运动。这是探索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方式和扩大民主形式的重大举措，但是，由于党的领导人对政治形势的估计的错误和由此采取的错误政策，历史的发展出现了巨大回流，并且导致在理论上的失误，“左”的错误思想给国家造成的严重影响越来越大。

整风指示发布后，各党政机构和党组织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鼓励“鸣”、“放”，听取意见，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响应，许多人对党和政府的工作，对党政干部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提出了意见和批评，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在此过程中，出现了复杂的情况，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利用这个机会向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了进攻，企图改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由于在整风中出现的这些问题被不适当地夸大了，1957年5月中旬，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改变了运动的主

题,将揭露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对敌斗争,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击资产阶级右派。毛泽东还采取“引蛇出洞”的“阳谋”,允许发表错误言论,暂不加批驳,以暴露右派的面目。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一场有组织、有领导的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斗争在全国范围展开。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右派确实存在,但毕竟是极少数,多数人在党的号召下提意见,出自真心,出于善意,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有积极的意义,但是,由于对阶级斗争和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将反右斗争大大扩大了,许多批评意见都被当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并且断定,右派的性质是敌我矛盾,这样就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变成了敌我矛盾,一大批党内干部、爱国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受到了严重打击。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和在这个斗争中采取的“引蛇出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划定右派的“热处理”、长官意志等等,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将共和国的社会政治生活引入了一个不正常的轨道。

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打断了对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正确方向。1957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三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问题的基本分析,毛泽东说:“‘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

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毛泽东的看法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的基本论断,到八大二次会议,则肯定了毛泽东的主张,认为:“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会议还认为,中国社会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一个剥削阶级是右派分子同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另一个剥削阶级是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是工人和农民。这样,知识分子实际上被列入第二个剥削阶级的范围。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实践反映到理论上,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成为后来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一次又一次扩大化错误的理论根源。

二

“大跃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挫折

反右派运动在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和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改变了在1956年底1957年初开始探索的正确方面,“大跃进”运动则是在国家经济建设方面,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引向了歧路。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如何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力,是稳定前进,还是不顾条件地加快速度,在党内存在着不同意见。1956年初,在经济建设上出现了不